



华章75年·解放记忆

开栏的话

75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历经艰辛、披荆斩棘,最终赢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这场胜利终结了中国长期的外来压迫和内部分裂,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启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硝烟散尽,日出东方,山河锦绣,天地沧桑。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本版即日起推出“华章75年·解放记忆”专栏,重温解放战争时期的峥嵘岁月,回顾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在国家解放与民族复兴之路上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



2024年4月28日,哈尔滨解放纪念馆在黑龙江山五国防文化博物馆正式开馆。

“共和国长子”的历史担当

张岱臣 王凤春

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同志自苏联访问后回国,途经哈尔滨视察。在听取黑龙江省委军政领导广泛汇报后,毛泽东同志称赞哈尔滨是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解放东北乃至全国作出重要贡献,是“共和国长子”。当时的东北,拥有超过30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和3800多万人口,煤产量占全国的49%,生铁产量占全国的87%,钢材产量占全国的90%以上。到中共七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曾多次说道,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东北成为共产党在全国战略布局中的重中之重。

哈尔滨回到人民手中。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给刘少奇的信中高瞻远瞩地预判到,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后,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日本投降后,苏联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约定,将哈尔滨市政权交由国民党政府接管。

哈尔滨在被国民党接收后的100多天里,由于国民党官员贪腐横行,城市暗无天日,工厂开不了工,经济更加凋敝,物价猛涨,致使百姓怨声载道。国民党政府还极力在社会各阶层中搞反共宣传,勾结伪警和土匪,收编日本关东军残余,到处搞暗杀、叛乱,社会秩序十分混乱。1946年3月9日,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李兆麟被国民党特务暗

杀,激起强烈的民愤。3月24日,6万多名哈尔滨市民为李兆麟举行公祭大会,各界群众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夹道伫立脱帽致敬,高呼“李兆麟将军不死!”“为李兆麟将军复仇”。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各界代表号召民众“继承烈士遗志,为争取东北和平民主而奋斗到底”。天日昭昭,民愤滔滔,国民党政权彻底丧失了民心,其国府要员惶惶不可终日,不得不弃政撤退。4月26日,130名各界代表联名吁请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在内外条件均已成熟的情况下,中共北满分局决定立即行动,以军事手段解决哈尔滨城内日伪残余和反革命势力,彻底解放哈尔滨。28日拂晓,进攻正式开始。各部队迅速占领指定目标,在解放军行动过程中,南岗和道外有个别地方出现小股敌人的抵抗和暗枪射击,解放军迅速将其歼灭。在解放大军的强大威慑下,城里的杂牌军纷纷缴械投降不战而败。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哈尔滨几易其手,最终回到人民手中。1946年4月28日这一天,哈尔滨的百姓生活看上去波澜不惊,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家作主的不再是侵略者和伪政府,而是生活在这里的广大人民群众。哈尔滨这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在饱尝了14年日寇蹂躏践踏和国民党腐败统治之后,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迎来东方第一缕曙光。

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基地。作为新中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哈尔滨不仅是东北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是东北解放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支援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后方基地。1946年底,哈尔滨市委向全市人民发出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号召,各行各业开足马力,加班加点,发展军工军需生产,全力支援东北和全国解放。哈尔滨百姓踊跃参军参战,战斗队、运输队、医疗队、慰问队以及大量武器物资源源不断支援到前线。东北野战军部队从三江江南、四保临江到辽沈战役,从平津战役到衡宝战役,从广西剿匪到勇渡琼州海峡,都离不开强大的后勤支援保障。

据统计,在1947年1月到1948年东北野战军夏、秋、冬攻势中,哈尔滨各级政府先后派出马车1279辆,组织担架队员、汽车司机、医护人员和前线工作团共2.8万人支援前线。在四平战役中,哈尔滨承担了2700名伤病员的救治任务,动员73名医生和248名护士承担护理工作。在“三江江南”中,哈尔滨组织了10批共19个医疗队、320名医护人员,分赴战勤医院救治伤病员。在辽沈战役中,哈尔滨组建了以卫生局长张柏岩为首的战地医疗队,87名医务人员分成6个手术组,在前线先后完成2400例手术。1947年至1948年,哈尔滨共生产单军服64万套,棉军服47万套,棉大衣46万件,棉皮鞋40万双,夹皮鞋7万双,棉皮帽76万顶。在军工产品方面的贡献更为突出,在很短的时间内生产出大量枪炮。哈尔滨市各行各业,特别是工商界先后多次组织捐款捐物,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

随着全国解放形势的发展,为新解放区培养和输送干部的责任历史地落在哈尔滨青年干部学校(简称“青干校”)肩上。青干校学员有的被分配到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工会等部门工作,有的被指派参加接收长春、沈阳等工作,遍及东北解放区130多个市县。1948年5月,青干校又派出近千名青年干部奔赴部队、矿山、铁路、工厂和农村,支援各地斗争与建设。

城市管理与建设的排头兵。从哈尔滨解放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了管理大城市的探索。“共和国长子”不仅沐浴着党和人民赋予的荣光,也主动担当启动建国程序的历史重任。

一唱雄鸡天下白。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东北局在哈尔滨积极开展政权建设,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组建市委市政府;召开临时参议会,邀请外侨和民主人士参与政事;保护民族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生产,整顿金融,稳定市场;解决民生问题,确保生产生活、公共卫生、城市交通等城市系统正常运行;加强治安,稳定社会秩序,为人民安定生活提供保障。1948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介绍哈尔滨市经济工作经验,为其他陆续解放的城市提供示范。同年,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代表518人,在这里共商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作发展大计。在这座城市里,不仅有人民军队运筹帷幄书写战争史诗,也有共产党人凝神聚力探索城市建设答卷。

黑土破晓万物生。新中国成立后,哈尔滨开启从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现代工业城市的规划。“一五”时期,哈尔滨被中央确定为重点建设的工业基地城市,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重点工程中有13项落户哈尔滨。随着“三大动力”“十大军工”等重工企业相继诞生,哈尔滨迅速成为一个以机电工业为主体,国有大中型企业为骨干,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基地。与此同时,哈尔滨也在政策鼓励下,新建、扩建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农学院、东北林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黑龙江商学院等十几所高等院校,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储备。

雄关漫道,迈步从头越。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和哈尔滨解放78周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回望解放战争时期那段历史,既有重生之感,也有英雄之豪迈。千年风雨,前路犹长。历史记录了一座城市与一个国家走过的路,也时刻提醒人们,走得再远,再辉煌,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读兵书 研战策

原典

善武者,噪以动之。善守者,静以待之。

善于进攻的,虚张声势以调动敌人;善于防守的,沉着冷静以应对敌人。《投笔谈·持衡》篇,用了较大篇幅论述在战术层面上,如何发挥优势、减少劣势,通过不断权衡利弊得失,来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战术行动。而本句直接点明进攻或防御时应当采取的措施,成为本篇中指导攻守双方筹划行动的重要依据。

经典战例

楚国将领昭应率大军攻打韩国的城池雍氏。经过数月战斗,韩国的兵力损失惨重,国内存粮也即将告罄。一番商议之后,决定派遣使者前往周王室借兵借粮,以抵挡楚国的进攻。周赧王接到韩国求援后,马上与谋臣苏代商议此事。一方面,周赧王名义上还是周朝天子,贸然去帮助一个诸侯国对抗另一个诸侯国,难免树敌过多、危及自身。另一方面,周王室处于战国漩涡的中心,自己的国土也被四邻不断蚕食,兵力、粮草并不富足,即便答应韩国的请求,也很可能是杯水车薪、收效甚微。于是,苏代建议周赧王,既不出兵、也不借粮,拉拢韩国一起固守防御、静观其变。

苏代的建议得到周赧王首肯后,他马上出使韩国,面见韩相公孙仲。他向公孙仲分析道,楚军主将昭应在出征之前就夸下海口,认为韩国屡战屡败的摧残,兵力渐弱、府库空虚,不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将其击败。现在5个月过去了,雍氏还在韩国手里,这样的情况肯定已经让楚国内部产生了分歧和怀疑。倘若韩国此时向周王室借兵借粮,无疑是告诉楚国人自己快撑不住了,昭应一定会借此机会鼓动楚王增兵,那么雍氏必然不保。所以,一动不如一静,再坚守一段时间楚军必然自乱阵脚。

公孙仲采纳了苏代的建议,并将本国的高都城送给周王室,以此获得了周王室的默许。果然,楚军见久攻雍氏不下,最终撤军退走。

战例解析

从战术运用的角度来看,苏代的分析和建议颇有道理。韩国本身就是守城一方,与楚军的实力对比也处于劣势,无谓的增兵只会徒增己方的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已经窥探到敌人存在内乱的可能,不如通过“静以待之”防守方式,以时间为武器,促使敌军不战自退。

努力削弱敌人的战斗意志。克劳塞维茨认为,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的锋利刀刃。所以说,精神因素在战场上的集中表现,就是部队继续战斗下去的意志。攻者攻其心,守者守其气。在战斗中,不管是进攻一方的“噪以动”敌,还是防守一方的“静以待”敌,都是通过一定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不断疲惫对手,消磨对手的战斗意志。雍氏之役中,苏代正是通过这种方法,让强大的楚国军队无从下手,可谓“一记重拳打在了棉花上”,劳师远征又久无战功,楚军上下的厌战情绪和自我怀疑不断扩散加剧,最终致其退兵。

牢牢抓住敌人的战斗弱点。朝锐,显气情,暮气归。在战斗过程中,军心士气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战士们披坚执锐、往来奔命,如果没有高昂的士气,根本谈不上克敌制胜。经过5个多月的战斗,楚军的士气早已从“锐”降低到“惰”,甚至产生了“归”的趋势,这无疑给韩国提供了难得的破敌良机。此外,“攻城之法,

韩楚雍氏之役——活学活用攻守噪静的辩证法

王彤周一

为不得已”,楚军所进行的攻城作战,是历代兵家最不推崇的一种进攻模式。更为严重的是,“城不拔者,攻之灾也”,随着时间推移,楚军的战斗力已经达到了顶点,再也无力发动更强的攻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时间就成为韩国最好的武器,再加上有了周王室的支持,成为压倒楚军的“最后一根稻草”,再不撤军、战力渐弱,恐怕会遭到灭顶之灾。

辩证看待攻守强弱的问题。就雍氏之役而言,一开始韩国防守,楚军进攻,但是随着战事发展,楚国的内部矛盾逐渐成为影响战局的主要矛盾,韩国寻求外援、积极防御、守中有攻,楚军兵势渐衰、苦苦支撑、攻不如守。这样一来,使原本十分明晰的攻守状态逐渐模糊起来,交战双方呈现出一种犬牙交错的斗争状态。就“善武者,噪以动之。善守者,静以待之”而言,也不能绝对地认为这是给进攻和防守双方定下的行动准则。正如古文中常用的互文修辞手法一样,进攻一方若形势所需也可以“静以待之”,防守一方若出现良机也应当“噪以动之”。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在总体上处于劣势、守势的情况下,我军能够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充分调动对手、疲惫对手,实现了“噪以动之”的战术效果。而在平津战役期间,处于优势、攻势一方的我军,对北平围而不打,通过“静以待之”的方式实现了和平解放。

紧紧围绕政治目的指导战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古往今来,不管战争的广度、烈度、深度如何,都是政治“这只无形的大手”在背后掌控的结果。韩国受难,其本能的反应就是向当时名义上的“宗主国”周王室求援,而他国求援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周王室并没有把保全韩国作为自己的政治目的之一。从苏代向周赧王提出的建议中不难看出,身处动荡世世的周王室已经是自顾不暇,此时他们的核心目标就是尽量保住自己残存的国土与地位,与强国为敌恰恰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是绝不可能实施的行动。而在实现政治目的的具体行动上,更应当注意方法和节奏,使最终形成的结果不偏不倚,处于自身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苏代以时间为抓手,巧妙地规避了“对韩国帮与不帮”和“对楚国破与不破”的两难境地,在危局之中稳定了态势,不失为一个能够全身而退的良机。



1946年4月29日,《哈尔滨日报》上刊登的《为进驻哈尔滨告哈市同胞书》。

搪瓷杯记载的峥嵘岁月

蒲元 刘涛

在陕西省西安市渭电社区文化服务站红色藏品展上,曾展出过一只白色搪瓷杯。在众多布满岁月痕迹的老物件中,这只搪瓷杯显得普普通通,直到笔者见到它的制造者——原西安搪瓷厂职工胡双印,以及它的所有者——志愿军高炮第542团老战士李世斌,一段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生产的往事被他们娓娓道来。

1950年10月5日,第19兵团第63军作为第二番入朝作战部队,奉命调往山东邹县集结待命(次年2月入朝,后参加第五次战役)。在此之前,第63军驻陕西三原、耀县等地,担负开荒建设、修建铁路及剿匪等任务。

就在部队主力转进山东不久,留驻陕西的第63军留守处接到上级指示,要求创办一所搪瓷制品厂,为志愿军生产日用和医疗搪瓷器皿。留守处随即选派邱聘之、邱林杰、马儒英等12名官兵,以部队开荒生产所得的20万元为开办经费,在陕西西安筹备建厂。

场地是建厂的基础。为了尽快“安

家落户”,筹建者在西安小东门外中兴路上寻得一片面积约9000平方米的院落。这里曾开办过一家私人织布厂,因经营不善早已歇业。院内荒芜破败,甚至一些屋顶出现塌陷。考虑到距陇海铁路较近且租金便宜,邱聘之等商议决定厂址就选在这里。西北地区第一家搪瓷企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3军后勤部生产科所属西安搪瓷厂,就此诞生。

拿惯了枪杆子的军人,面对搪瓷烧制却犯了难。从西安搪瓷厂建厂初期的一份组织结构表上可以看到,排在全厂各部门重要位置的技术研究室所设的设计制图员和技术检查员岗位下方,均标注“需调来”字样;在生产管理科下设的车间记录员及其他不少重要岗位下方,也都标注着“需调来”。为解决关键的人才和设备问题,邱聘之赶赴当时中国搪瓷业最发达的上海招兵买马。经过不懈努力,不仅购买了相关设备,还想方设法请到28名自愿支援西北建设的搪瓷工人。这些技术工人到来后,很快成为西安搪瓷厂生产的中坚力量。同时,第63

军留守处也从其参与的公私合营三原凤利铁工厂选调了一批骨干支援西安。这其中就有年轻的铁工厂学徒胡双印,后来他成长为西安搪瓷厂领导和该领域著名专家。

在解决了场地、厂房、设备、人才、工艺等一系列难题后,西安搪瓷厂终于在1951年下半年试制面盆成功,正式运营投产,次年注册第一个商标“白鸽”。与此同时,该厂生产的搪瓷杯、食盆、饭碗等,开始源源不断供应朝鲜前线部队。这些搪瓷用具,很快成为志愿军官兵战地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由祖国慰问团带给志愿军官兵的慰问搪瓷杯,白色杯身,天蓝色滚边,展翅的白鸽飞翔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巍峨的华表高高耸立,杯身上“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或“献给最可爱的人”等字样鲜红醒目,寄托着祖国人民对志愿军官兵的情谊和赞许,成为记载伟大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个特殊时代印记。

1952年5月,上级决定,西安搪瓷厂由军队系统移交西安市政府管理,改名



祖国慰问团赠送志愿军官兵的慰问搪瓷杯。

为地方国营西安市人民搪瓷厂(原军队人员继续留厂担任管理职务)。尽管隶属关系有所变化,但该厂军民共建、保障军需的初衷始终未变。1953年,全厂工业产值达到107万元,产量541吨,有效保障了志愿军各类搪瓷制品的供应。同年,该厂特制的40公分飞天饰花反口面盆被作为高规格礼品赠送给访华的朝鲜领导人。1962年,时任厂长的马儒英还赴京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战争的烽烟已经远去,小小搪瓷杯所承载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保障故事,将永远流传下去……



位于陕西省岐山县的中国·周原景区。